

# 柳宗元研究文集



广西人民出版社

# 柳宗元研究文集

柳州市柳宗元学术研究会编

主 编：谢汉强      陈琼光

孙代文      戴义开

编 委：罗安鹄      罗永平

杨 奔

广西人民出版社

**(桂) 新登字01号**

**责任编辑 欧薇薇**

**柳宗元研究文集**

**柳州市柳宗元学术研究会 编**

---

**出版发行 广西人民出版社**

**(邮政编码: 530021)**

**南宁市河堤路14号)**

**印 刷 柳州市印刷厂**

**开本 850毫米×1168毫米 1/32**

**印张 12.5625 字数 30.2 千字**

**版次 1993年7月 第1版**

**印次 1993年7月 第1次印刷**

**印数 1—2000册**

**书号 ISBN 7-219-02452-5/K·239**

**定价: 8.50元**

# 序

吴文治

近几年来，当年柳宗元谪居的柳州，涌现了一批柳学爱好者和柳学研究者，写了不少有关柳宗元文章，其中有相当数量的学术研究论文发表在国家一级和省市级的期刊和报纸上。为了在柳宗元国际学术讨论会上进行学术交流，他们选编了这本《柳宗元研究文集》。

由于对柳宗元研究的共同爱好，从六十年代中期开始，我便与柳州研究柳宗元的同志时有往来，交上了朋友。所以，关于柳州研究柳宗元的情况，我是比较了解的。前年十一月，我在桂林参加完中国首届诗话词话学术研讨会后，曾应邀到柳州参观并考察柳宗元在柳史迹，与柳宗元学术研究会的同志一起进行座谈，所见所闻，都使我耳目一新，得益不少。

我深深感到，柳州人民对柳宗元仿佛具有一种特殊的感情。他们对柳宗元史迹和文物的保护和修缮，处处洋溢着一种对先贤的崇敬和景仰之情；关心、爱好和研究柳学，在广大市民中也蔚然成风。据说凡遇有关于柳宗元的讲演，七八百个座位的礼堂就往往座无虚席；在山村道旁的个体小饭馆里，甚至连十几岁的普普通通的女服务员，也往往能给你诵几首柳宗元的诗歌，说几个有关柳宗元的小故事。这使我想起了有人曾以“凡有井水处，即能歌柳词”来形容柳永词在群众中传播之广。柳宗元在柳州，大概也可以说得上是个家喻户晓的人物。

1985年8月8日，柳州市成立了柳宗元学术研究会，确定要把柳学作为专门学问来研究的宗旨，争取把柳州逐步建成为柳学研究的资料中心和活动中心。此后，柳宗元的学术研究活动，便在柳州展现出了一个新的局面。他们在市委、市府的领导和关怀下，与市博物馆等有关单位协作，积极开展和组织学术研究活动，配合和参与涉柳的地方文化活动和文化建设，取得了十分可喜的成绩。

柳州市柳宗元的学术研究工作，是在普及的基础上不断得到提高和发展的。他们既重视对柳宗元全部历史全部思想的全面研究，也重视对柳宗元在柳史迹及文物等方面的局部研究，充分发挥了柳州市柳学研究者在地理条件等方面特有的优势。从已经取得的成果来看，无论是宏观研究或微观研究，都可以说是硕果累累。仅就本书所收录的论文而言，哲学、政治、文学、历史、教育等各个方面都有专论，不仅涉及面广，而且有一定深度。例如研究柳宗元哲学思想的几篇论文，针对学术界有争议的重要问题（如柳宗元与佛教、柳宗元的“统合儒释”、柳宗元的自然观不是二元论等）进行论述，有论据，有分析，都具有一定的说服力。探讨柳宗元社会历史观和文学创作方面的文章，也都有自己的创见，能给人启发。

结合柳宗元在柳史迹进行研究和考辨，更有利于充分发挥柳州同志研究柳宗元的特有优势。他们所写的关于这方面的短文，佳作颇多。如对柳州柳书石刻的考辨、“三绝碑”并非“罗池庙碑”的考辨、“龙城石刻”真伪的考辨、“荔子碑”与“荔子碑”中简化字的考辨，等等，短小精悍，言之有物。也许由于篇幅的原因，本书中未能广为收录，但从所录《柳宗元柳州事迹考》所包括的十一篇短文亦可略见一斑。偶读其中《是“东西”还是“东面”》一篇，使我联想起我们校勘《柳宗元集》

（即中华本）时的往事，《柳州山水近治可游者记》中的“雷山，两崖皆东西，雷水出焉”一句，读起来总感到费解。但我们用来对校的十八种版本却均无异文，仅王荆石本怀疑“恐有误字”，又未指出“误”在何处，因而不敢迳改。前年读了考辨文章，又经过实地考察，始悟“西”字乃“面”字之误。

在柳宗元文物史迹较多的柳州，完全有条件可以逐步建成柳学研究的资料中心和活动中心，可以考虑把现在的柳侯祠扩建成为“杜甫草堂”或“黄梨洲纪念馆”那样的既有文物收藏又有图书资料可供参考的“柳宗元纪念馆”，并创办一个适当的刊物。这对组织和发展柳宗元学术研究，定将发挥有力的推动作用。这次柳宗元国际学术讨论会的胜利召开，也足以证明柳州完全有能力有条件来担当这个中心的重任。

1993年3月27日于南京

## 目 录

|                                  |                  |
|----------------------------------|------------------|
| 序.....                           | 吴文治 (1)          |
| 论柳宗元的社会历史观.....                  | 蒙仁周 (1)          |
| 柳宗元与佛教.....                      | 谢汉强 (5)          |
| 柳宗元民论研究.....                     | 郭绍明 周桂钊 (21)     |
| 柳宗元天论研究.....                     | 周桂钊 郭绍明 (35)     |
| 柳宗元认识论若干问题初探.....                | 林雨如 郭绍明 蒋富生 (63) |
| 试论柳宗元的“统合儒释”.....                | 王一民 (75)         |
| 柳宗元的自然观不是二元论.....                | 谢汉强 (87)         |
| 朱熹理学与柳宗元思想的对立.....               | 戴义开 (93)         |
| 试论柳宗元唯物主义哲学思想的形成和来源<br>.....     | 唐天禄 (101)        |
| 试从《天对》看柳宗元在中国无神论思想史上的<br>地位..... | 覃 溥 (113)        |
| 《周易》的运变法则给柳宗元的影响.....            | 潘朝业 (126)        |
| “异儒”之“异”.....                    | 廖剑鸣 (134)        |
| 柳宗元的社会历史观.....                   | 陈一鸣 (143)        |
| 柳宗元治柳思想初探.....                   | 戴义开 (148)        |
| 柳宗元官论简述.....                     | 谢汉强 (161)        |
| 柳刺史的为政之道.....                    | 朱芳义 (172)        |
| 柳宗元教育思想辨析.....                   | 孙代文 (180)        |
| 韩柳异同新论.....                      | 王一民 (193)        |
| 无神论是柳宗元搞政治革新的思想基础.....           | 苏培干 (203)        |

## 浅谈柳宗元在“西原问题”上的“大一统”思想

- .....覃 溥(208)
- 柳宗元在柳州.....肖泽昌(213)
- 柳宗元柳州事迹考.....谢汉强 戴义开(219)
- 柳宗元山水诗的和谐美.....孙代文(233)
- 柳宗元山水游记的意境美.....程 朗(246)
- 试论柳宗元的文学主张.....陈琼光(255)
- 变“骚”论.....杨 奔 陈中林 鲁永良(269)
- 略谈柳宗元柳州诗的悲剧美.....李 刚(288)
- 柳宗元诗词的政治革新思想.....苏培干(293)
- 评《古文观止》对《柳子厚墓志铭》一文的评注

- 兼论韩柳关系.....王一民(298)
- 寄情山水间

- 浅谈柳宗元山水游记的艺术美.....陈琼光(306)
- 《龙城石刻》是“讨武檄文”吗?.....谢汉强(320)
- 台港柳学研究概况.....谢汉强(328)
- 浅析柳宗元与岭南少数民族的关系.....覃国宁(334)
- 台版《柳子厚寓言文学探微》简介.....谢汉强(340)
- 《山水记》初探.....戴义开(347)
- 柳宗元柳州著述考略.....戴义开(355)
- 试析《始得西山宴游记》的气功描写.....区克莎(367)
- 柳刺史“贬”、“迁”析.....戴义开(383)
- 从大云寺到陆道岩.....戴义开(388)
- 后记.....(393)



# 论柳宗元的社会历史观

蒙仁周

在柳宗元的哲学著作中，贯穿着一条重视“人”的主线。他提出了“生人之意”、“生人之理”、“遂人之欲”、“厚人之生”的主张（人，即民，人民。唐人避唐太宗李世民的字讳，故改民为人）。这是具有现实意义的进步的社会思想。本文就这些进步的思想主张，作一些分析。

柳宗元在社会历史观上，提出了“生人之意”的观点，“言唐家正德，受命于生人之意”。（《柳宗元集》，中华书局1979年版，第30页。以下凡引此书，只注明页码。）“生人之意”是“天命论”的对立命题，意思是说人类历史也同自然界的发展一样，有它自己的规律。历史上的改朝换代，“非圣人之意也，势也”。（第75页）“生人之意”和“势”，是一个问题的两种表达，都是董仲舒以来的“天命论”和“君权神授”的神学观的对立观点，是当时社会历史观上的一个进步。

在如何治世方面，柳宗元提出了“生人之理”的观点。他认为，“夫天下之道，理安斯得人也”。“继世而理者，上果贤乎？下果不肖乎？则生人之理乱未可知也。”（第74—75页）人要顺理顺道，社会的发展也应顺理顺道。“道德之于人，犹阴阳之于天。”（第80页）“顺时之得天，不如顺人顺道之得天。”（第90页）柳宗元认为，顺人顺道，关键在人。“言天而不言人，是惑于道者也。”（第90页）用什么样的人才能顺

人顺道呢？柳宗元提出了任人唯贤的用人观点，反对任人唯亲。“赞杰俊。遂贤良，举长大”（第86页）“使贤者居上，不肖者居下，而后可以理安。（第74页）为了选拔“贤人”，他还主张用人不分贵贱，“贱妨贵、远间亲、新闻旧。”（第95页）即是说身份“贱”、关系“远”、资历“新”的人，只要“贤”就可以启用，可以超“贵”的、“亲”的、“旧”的人。

柳宗元很强调“自然”。他说：“庄周言天曰自然，吾取之。”（第80页）用自然的观点对待人生，柳宗元提出了“遂人之欲”，即主张尊重人的生存权利。这种思想反映在柳宗元的《种树郭橐驼传》一文中，柳宗元借“养树之理”来讲“养人术”。柳宗元以“养树之理”同“官命”对立，表达他同情劳动人民蕃生安性的生存权利，批判统治阶级“好烦其令”，剥夺人民的生存权利的罪行。强调按照自然规律办事，还表现在他的《时令论》一文中。他主张出政令要有利于农业生产，不违农时。他说，春季要及时修整田界、城乡道路，察看土地适合种什么作物，筑堤坝，疏通沟渠，禁止在田间打猎，备好养蚕的器具，合群放牧牛马，以利牲畜配种。少召集百姓，使各种农事都不误农时；夏季要鼓励农民从事农业生产、施肥、耘田、杀草，不随便挖河堤；秋季收割完了，及时备柴苇、草料，贮藏蔬菜，伐薪烧炭，做衣裳；冬季进入农闲季节，挖窖修仓，藏好粮食，分列谷种，计划来年农事，等等，（第85页）从这里可以看出，柳宗元对让劳动人民自主生活权利的思想是较为突出的。

柳宗元重视“人”的历史观，还表现在他描绘“厚人之生”的“理想主义”。他幻想出现的社会是“群邪殄夷，大道显明，害气永革，厚人之生，岂不圣且神欤！”（第493页）

他认为应当“赐贫穷，养幼少，恤孤寡，养衰老，任有功，诛暴慢，申严百刑，斩杀必当。”（第85—86页）为了实现“厚人之生”的理想，柳宗元特别针对当时“贿赂行而征赋乱”、“贫者愈困饿死亡而莫之省，富者愈恣横侈泰而无所忌”（第832页）、“赋敛之毒，有甚是蛇者”（第456页）的不合理现象，提出“均赋役”、“定经界”、“核名实”的主张。他说：“……若皆得实，而故纵以为不均，何哉？孔子曰：‘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贫而患不安，今富者税益少，贫者不免于捐拾以输县官，其为不均大矣。然非唯此而已，必将服役而奴使之，多与之田而取其半，或乃出其一而收其二三。主上思人之劳苦，或减除其税，则富者以户独免，而贫者以受役，卒输其二三与半焉，是泽不下流，而人无所告诉，其为不安亦大矣。夫如是不一定经界、核名实，而姑重改作，其可理乎？”（第832页）柳宗元对豪族地主阶级在赋税方面剥夺劳动人民的财力的揭发批判，以及适当减轻贫户负担，增加富户赋税，以利发展生产和社会安定的主张，有一定的进步历史意义。

从上述可以看出，柳宗元重视“人”的历史观是比较突出的。他提出的“生人之意”、“生人之理”、“遂人之欲”、“厚人之生”的观点，丰富了中国唯物主义思想史的许多内容，有一定的积极意义。柳宗元年青时就立志“励材能，兴功力，致大康于民”。（第876页）他在被贬逐以后的长期贬谪生活中，比较深刻地观察到社会的黑暗，体验到劳动人民的疾苦，使他的上述思想更加坚定，所盼望的仍然是“生人之性得以安，圣人之道得以光”（第840页），“仕虽未达，无忘生人之患”（第841页）。从这里可以看出他一生的理想抱负。

在柳宗元的社会历史观中，虽然提出了“人”和“天命”

的对立，表现了一定的进步社会思想。但是，由于历史的局限和阶级的原因，他不可能揭示历史发展的真正动力和客观规律，他的社会历史观仍然是唯心主义的。他的历史观存在着许多矛盾：

（一）既肯定历史发展是“生人之意”，又逃脱不了宿命论的束缚。他认为“天集厥命，惟德受之；胤怠以弃，天又祐之”（第395页），“今天子兴教化，定邪正，海内皆欣欣怡愉，而仆与四五子独沦陷如此，岂非命欤！命乃天也。”

（《柳河东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74年版第493页）“命有好丑，非若能力。”（第50页）

（二）既向往“厚人之生”的理想社会，又把实现这个理想的希望寄托在“圣君”对“贤才”的选拔和实施“德政”上。既提出“均赋税”、又认为贫者不可颠倒，“夫富室，贫之母也，诚不可破坏”。（第332页）

（三）柳宗元在被贬官后，找不到出路，无可奈何地想从佛学中寻找精神上的安慰。佛教思想在他的世界观中虽然不占主导地位，但是他好佛这一点，不能不使他的无神论思想有所逊色，冲淡了他唯物主义的战斗性。

纵观之，柳宗元提出的“人”与“天命”的对立，在他的历史观中占主导地位，同时存在着宿命论和用信佛作安慰的矛盾。同他的唯物主义和无神论的自然观相比，他的历史观是唯心主义的。但是，柳宗元重视“人”的历史观，在中国哲学史上仍不失去它的光辉。

# 柳宗元与佛教

谢汉强

## 一、两种互相矛盾的现象

柳宗元自称“自幼好佛”，在长安生活期间，就和一些沙门僧侣交朋结友，过往甚密。被贬永州、柳州之后的十五个年头中，更常与佛门弟子朝夕相处，说佛谈禅。据粗略统计，他一生给和尚们写过十二篇赠别序文，为佛教寺院和死去的和尚写了十二篇碑铭，为寺院的修建写了六篇记叙文章，还在与僧侣的交往中写了二十首诗。这些直接涉佛诗文的数量，多达近五十篇，在整部《柳河东集》中差不多占到十分之一。柳宗元对天台宗 颢 智的大乘“空宗”思想有过推崇，对禅宗惠能的“无为”之说也有过谀词。在永州时，他那来历不明的女儿和娘染病在身，胡里胡涂地说了句“佛我依也，愿以为役”，他就同意将她改名为“佛婢”；女儿病势加重，要求削发为尼。他也首肯，并又同意将她改名为“初心”。女儿死了之后，柳宗元还专门写了《下殇女子墓砖铭》，特意记下了这一桩事情。到了柳州之后，又是急急忙忙修复毁了很久的大云寺，又是十分认真地写了禅宗六祖的碑铭文。这些，都可以作为柳宗元好佛的佐证，也说明了他和佛门的关系之深。于是，在研究和评价他的哲学思想的时候，有的据此说柳宗元的思想是二一添作五，“半截唯物，半截唯心”；有的据此认定他是一个虔

诚的佛教徒，并且推出唯物主义思想“在他的整个世界观中是居于被支配的、非主要方面的地位”的结论，说得了当一点，就是认为唯心主义在柳宗元的思想中居于支配的、主导的地位，他基本上是唯心主义者。

如上所述，柳宗元好佛的表现确乎突出，但是翻开同样一部《柳河东集》，我们却又可以发现，他抑释的态度也颇为鲜明。

贞元十五年，27岁的柳宗元在集贤殿正字任上，也是已经好佛的同时，曾经为他的同族先人柳浑写了一篇《柳常侍行状》。文中曾不惜笔墨，相当详细地记述了柳浑童年时这样一段经历：年十余岁，有称神巫来告曰：“若相法当天且贱，幸而为释，可以缓死耳。禄位非若事也”。公诸父素加抚爱，尤所信异，遽命夺去其业（指学业），从巫言也。公不可，且曰：“夫性命之理，圣人所罕言，缙绅者所不道，巫何为而能尽之也？且令从之而生，去圣人之教而为异术，不若速死之愈也”。于是为学甚笃。柳宗元不仅突出描写了这件事，而且还专门就柳浑宁死也不愿去当和尚的表现发表评论大加赞扬，说“其在童幼，固不惑于怪譎矣！”还说这是“拒疑独断，明识也。”

柳宗元血气方刚时反映出的这种思想，到了晚年也还有明显的表露。元和十四年，他在柳州临终前不久，应桂管观察使裴行立之请，为裴死于桂州的族兄写了一篇《故处士裴君墓志》，里面对于这位裴君的父亲裴伯言“摧佞抑释”的事迹热情赞赏。唐德宗建中年间，李叔明曾上书痛陈道佛之弊，德宗下旨叫尚书省杂议，刑部员外郎裴伯言积极支持李叔明的主张，并且针对当时大量青壮年劳力流入佛寺的情况提出了抑制佛教和道教的具体措施：“僧道士限年六十四以上，尼女官四

十九以上，许终身在道，余悉还为编入，官为计口授田，收废寺观，以为庐舍”，以便把户口和赋税掌握到国家政权手中。柳宗元把裴伯言“议官及浮图事独出，载在史册”这件事特地写进他的儿子的墓志上加以褒扬，不能视为逢场作戏的无心之言。

上面引出的这两份表明并不佞佛的思想资料，在谈论柳宗元佞佛的文章中往往被遗漏，这就不方便人们了解他思想的全貌和对他的复杂的思想进行分析和探讨。

## 二、一条治学的根本旨趣

柳宗元既明显好佛，又赞扬抑释，这种矛盾现象，并不奇怪，这正是他的思想上具有正确和错误、积极和消极的两重性，他在中国古代思想史上既有建树又有失足的一种反映。我们可以透过这类矛盾现象，进行具体分析，探寻一下柳宗元思想的真实面貌和他治学的特点。

柳宗元明白地说过，他做学问，写文章，“不以是取名誉，意欲施之事实，以辅时及物为道”。他“读百家书，上下驰骋”，品评文章利病，是为了探求“理乱之本”，“以售圣人之道及乎人”。解决社会治乱兴衰的问题，医治社会的弊病，追求“生人之性得以安，圣人之道得以光”。这是柳宗元治学的根本旨趣，也是他哲学思想的一大特点。

本着这一宗旨，柳宗元对于古今各家的学说，不管是正统的或非正统的，不管是儒家或杂家的，不管是创自华夏和来自外夷的，他都是既非全盘接受，也不一概排斥，而是从自己的时代和本阶级的利益出发，按照自己的需要和自己认定是否“有以佐世”的标准，“咸伸其所长，黜其奇邪”，有所吸收

和继承，也有所批判和舍弃。柳宗元生活在我国封建社会中期的唐代，这时，孔孟创立的儒家学说，早已被改造充实成为封建地主阶级服务并且占据着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柳宗元作为一个地主阶级思想家，也不能不具有“好求尧、舜、孔子之志唯恐不得”“遇行尧、舜孔子之道唯恐不嫌”的崇儒色彩。但是他并不是独尊儒术而排斥百家，而认为无论是杨、墨、申、商、刑、名、纵横、庄、老各家的学说，都有可取的长处，应当把它们与儒学糅合起来加以利用。他十分赞赏儒学的中庸之说而致力出入“中庸之门户阶室”，说自己是“勤勤勉勉，唯以中正信义为志，以兴尧、舜、孔子之道”，但是他对儒学并非句句照办，如对其中心鼓吹推天引神的天命论、天人感应的唯心主义观点，给予尖锐的批判，从历代唯物主义者和进步思想家的遗产中吸取有益的养料，发出了“不引天以为高，不穷异以为神”的响亮声音。他以《天说》、《天对》、《贞符》、《封建论》、《时令论》、《断刑论》、《非国语》等等大量的哲学著作，阐发了元气一元论的朴素唯物主义思想，批判了唯心主义，并从唯物主义的自然观出发，从对天上的批判转入地上的批判，力求从人类社会本身探寻人类社会变化发展的原因，阐发了“生人之意”、“势”决定社会变化发展的进步思想。今天，我们抱着科学的态度，对他的全部思想资料进行综合分析研究，就不会很难的看出，尽管他的思想很复杂，但唯物主义思想在他的世界观中还是占着主导地位的。

柳宗元对各家学说“伸其所长，黜其奇邪”，有好有恶、有取有舍的态度，在对待佛学问题上也是一样。伸、黜，好、恶，取、舍，都看它是否“利于人，备于事”，是否“有以佐世”，符不符合他所代表的阶级的利益来对待。

刚才已经提到，儒家学说在我国封建社会中是占据统治地



位的意识形态，柳宗元基本上是个崇儒的思想家，经常要打着儒家正宗的旗帜来言行。他对于佛学有一个总的看法，就是认为“往往与《易》、《论语》合”，“不与孔子异道”。所以，他就主张“统合儒释”来“宣涤疑滞”，把佛学与儒学结合起来，使“真乘法印与儒典并用”去疏导人们的思想、清除社会的积弊。他“自幼好佛”，就好在这点上。这在长安时所作的《送文畅上人登五台序》中说得十分明白。苏东坡说“子厚南迁，始究佛法”，其实是始究于长安，但柳宗元自己也说到了永州之后对于佛学是“独有得焉”，所得如何呢？主要的还是“统合儒释”的看法。在《送元十八山人南游序》中，提出了将各家学说，包括佛学与儒学“通而同之”的观点。到了柳州之后，这种思想进一步加深了，阐发得更清楚了。

“统合儒释”并不是柳宗元的发明和首创。佛教自汉代传入中国之后，为了站稳脚跟，必须与中国国情相结合。在统治阶级的倡导和支持下，佛教逐步吸收了中国的儒学传统思想来补充和丰富自己的形式，使之变成中国化的佛教。儒家学派也受着佛学的影响而不断丰富自己的学说，以加强封建地主阶级的思想统治。即使因为地主阶级内部（包括僧侣地主）之间的利害冲突而曾经发生过多次数毁佛反佛的事，但儒释合流的总趋势并没有逆转。柳宗元的《送文畅序》，开头就谈到了道林、道安、休上人等等“桑门之上首”喜欢与谢安石、王逸少、习凿齿、谢灵运、鲍超等等“时之选”即当时著名儒士交游，使佛门的“真乘法印，与儒典并用”的史实。柳宗元提出“统合儒释”，也反映了地主阶级需要找到一种理想的精神工具来维护自己的统治。

但是，他认为佛学“与《易》、《论语》合”，要“统合儒释”，是从整体上抽象地、笼统地说的。至于对于佛学的具体内